京城来者一律隔离？不能让“土政策”各自为政

□ 王钟的

“7月4日零时起，对全市低风险地区人员出京，不再要求持有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看到这个消息，很多因疫情“宅”在家里的北京市民，不禁松了一口气。随着北京近期的疫情得到有效控制，许多人期盼恢复必要的人员流动，释放受疫情压抑的出行需求。

尽管北京放松对低风险地区人员的出京要求，一些地方却没有及时转变防控政策。据《法制日报》报道，在北京发布上述通知后，全国其他多个地方并没有因此改变当地的防控措施。有些地方甚至要求，即使持离京前7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也要集中隔离或者居家隔离、健康监测。专家评价，各地各自为政实行“土政策”，给公众生活和经济组织复工复产带来极大的不便。

事实证明，自“西城大爷”作为首例确诊患者被发现以来，北京的处置是及时有效的，疫情在短时间内得到控制，目前已有几日“零新增”报告。国内外媒体评价，与之前在武汉疫情暴发时所采取的全面封锁不同，这次北京采取的措施更有针对性，其举措也更值得其他国家在复工和重启时借鉴。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当下，人们不希望再出现反弹的情况，但也不能过度乐观、掉以轻心。一旦再有地方出现本地疫情，如何实施精准管控，在防控与维持日常社会秩序之间取得平衡，不让人们的正常生产生活受到不必要的干扰，应当是今后一段时间提高防疫水平的重点。

一些地方对来自疫情地区人员的防控，采取“各自为政”的做法，无疑违背了精准管控的原则。目前，从北京出发的旅客，不得不几经周折询问目的地有关部门，了解相关管控政策。有些时候，即便在同一个地方，不同层级、不同部门也可能给出不一样的答案，打了很多电话也未必得到确切的政策解释。据报道，在北京放松出京管控后，有北京市民为了回到老家，必须向社区报备，提交北京住址、当地住址、身份证照片、北京健康码、车票、行动轨迹等信息，甚至还要提供房产证照片。这些做法让有出行需求的人们无所适从。

一方面，一些地方对来自疫情风险地区的人们“一刀切”，而且政策变动迟缓，无法及时针对风险变化作出调整；另一方面，有的地方过度反应，明明有着大数据等科学技术的支持，却依旧以“土办法”实施管控。

疫情防控是对地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考验。如果不提高治理水平，还是沿用传统的治理思路，不仅妨碍商旅人士的出行，也会对本地发展造成困扰。按照最坏的情况设想，如果这些地方出现本地疫情，一定也不希望人们出行时被不加区分地“处处设限”。这种落后的防控思路还会影响其日常治理，表面上严格，实际上只是生硬的加码，面对突发情况时缺乏应变能力。

针对防控“各自为政”的做法，有专家提出建议，不能过度防疫，要分级分类精准防控，不能懒政实施“一刀切”。当然，如果仅仅凭借地方政府的沟通，也难以将各个地方的不同做法统一起来。只有加强“顶层设计”，在国家层面实施统一的管控制度，才能消除普通民众的“信息差”，减少社会的沟通成本，从而更有力地推动复工复产。

有备方能无患，北京近期应对疫情局部范围反弹的做法，为各地如何开展精准防控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不管怎样，那种一有少量疫情发生，经济活动就全面停顿的场面，是社会不能承受的代价。各地在开展防控时，理应不断改善方法，灵活调整防控政策，增加防控信息发布的透明度和及时性，从而提高政府治理现代化水平，真正让科学在防控中起到决定性作用。

一部上亿片酬的电视剧为什么“糊了”

□ 任 桉

近3年，关于明星演员的“限薪令”多次发布和重申。而最近，又有一条关于“天价片酬”的新闻占据公众视野。根据一家上市企业披露的信息，去年一部反响平平的都市职场剧，女主演最终得到的酬劳高达1.09亿元，男主演也有7700多万元。

为两位主演提供近2亿元的酬劳，是否为国产剧贡献了一部上乘之作呢？

与“天价酬劳”相对应的，是这部都市职场剧惨淡的口碑和市场反响：豆瓣网评分仅仅5.9分，打分人数也才1.5万人。参照最近某高口碑网剧豆瓣页面有60万人打分的标准，那部“天价片酬”换来的剧，用网络流行语说就是“糊了”。

付高价请演员的投资方、制作方，或许对这个选择是无悔的，甚至觉得很值得，可是花时间看剧的观众后悔自己为何追剧了。这部“扑街剧”的豆瓣评价前几条这样说：“满是浮夸的气息，所以这部剧就只剩偶像剧那点套路了”“国内职场剧一直以来都是噱头”。

再当红的脸蛋，也救不起崩盘的口碑。观众自然要问一句：为什么不把更多资金投入到剧本创作和拍摄制作中？

一部分演员坐享“天价片酬”，折射出魔幻的行业乱象：演员收入很高，作品很烂；投资方、制作方和平台过于迷信所谓“顶流艺人”“高咖位明星”，而对影视作品的基本质量不管不顾。剧集注水，糊弄观众，这是本末倒置，对影视行业长远发展有害无益。

选择有粉丝基础和商业价值的演员，固然能“开局”打下人气基础。可是，决定作品生命力的，终究还是剧本、表演、拍摄和制作等多个元素综合的共同作用。

一部影视作品，如果给个别演员开出过高片酬，就很容易造成这部作品创作的内部“失衡”。因为影视创作成本是固定的，而个别演员的“天价”片酬，势必破坏各项成本之间的平衡，严重挤压其他项目的开支，导致生产线在所剩无几的资金限额里“勒紧裤腰带”。

最近火爆的高口碑网剧《隐秘的角落》，堪称一部好剧，与那些开天价拍的烂戏形成对比。无大牌，无流量，却成了上半年爆款。观众能深切感受到，真正的好作品，就是要把每个环节都做到极致，做到专业层面的“顶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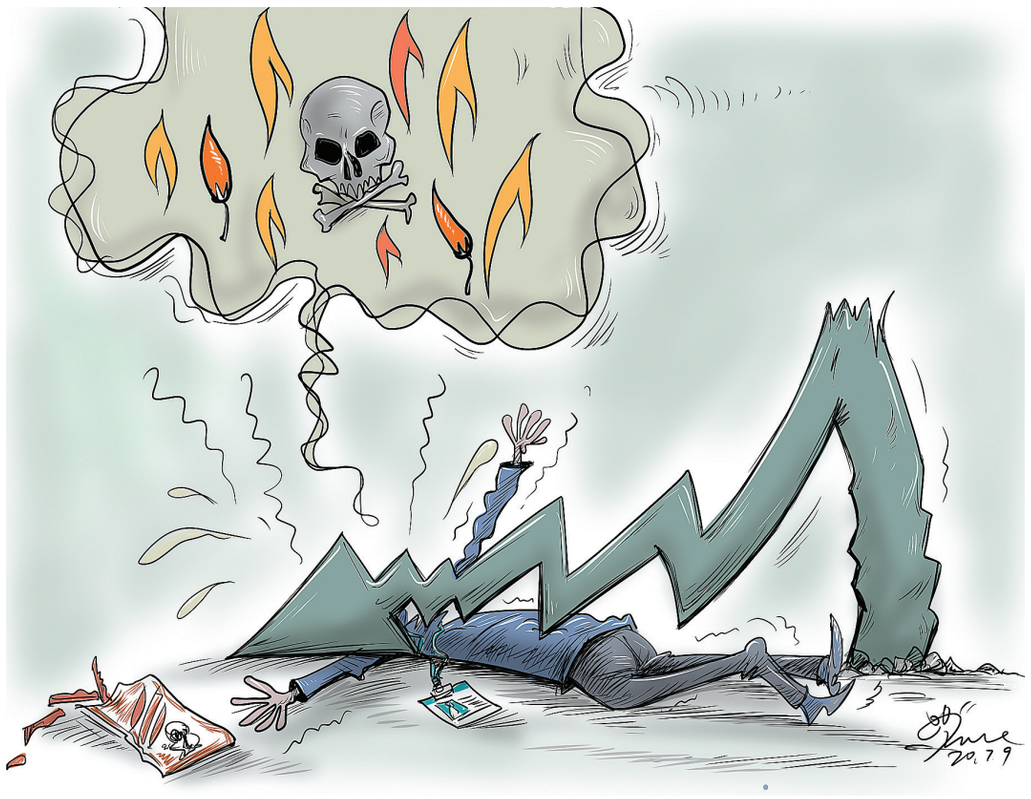
前段时间，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首都广播电视节目制作业协会发布《关于厉行节约，共克时艰，规范行业秩序的倡议书》，倡议影视制作行业应谨慎立项，慎重开机，提出一部电视剧、网络剧的编剧、导演和男、女一号主演的酬金，各自最高不得超过制作成本的10%，全体演员酬金不得超过制作成本的40%。

限制演员片酬在不影响拍摄品质的比例上，能避免剧集“灌水”、收视率造假、票房注水等不良风气。另外，对于演员参演影视项目的收入结构和模式，行业也应考虑作一些调整和改变。

近日，一个导演在微博上表示，明星片酬虽高，但能到自己手里的并不多，因为交完税后还要养活自己工作室团队一堆人；如果是签约公司的，公司要抽成。

这个导演说的固然也是事实，但对于部分自立门户的演员，他们人员繁多的工作室，也是抬高片酬的一项隐性因素。有些演员工作室在演员参演的同时，还会介入投资，然后参与后期分账。这种“既当选手又当裁判”、多捞一份油水的操作，无疑也不利于影视市场的规范运转。

为了避免“拿了钱不好好拍戏”的情况，影视行业不妨尝试片酬“基本收入+作品反馈”的机制，在保障演员获得基础劳动报酬的同时，将决定权交给市场和观众，让播出效果对演员收入发挥更大影响，而不是全然由投资方和平台根据自己利益和喜好来拍板。观众的反馈，才是演员市场价值最准确的“风向标”。



私 刑

成都一家财税服务有限公司对“业绩不佳”的员工进行惩罚，让员工吃两小袋“死神辣条”。结果，多名员工均出现了不同程度不适，两名女员工先后进了医院。记者调查发现，这种“死神辣条”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有消费者反馈“辣住院了”“吃完就胃痛，一直疼”“舌头疼死，喉咙疼死”等言论。（《华西都市报》7月9日）

漫画：徐 简

委托照护不是让家长当甩手掌柜

□ 史洪举

针对留守儿童得不到适当照护、缺乏亲情关爱的问题，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二审稿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因外出务工等原因在一定期限内不能完全履行监护职责的，应当委托具有照护能力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代为照护。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与未成年人和被委托人至少每月联系和交流一次，了解未成年人的生活、学习、心理等情况，并给予未成年人亲情关爱。

委托照护属于法律所创设的新名词。通俗而言，其指留守儿童或未成年人的父母委托具有照护能力的人代为照料、看护留守儿童，负责其起居生活与受教育等活动。在人口流动频繁、异地务工较多的背景下，落实委托照护无疑对留守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意义重大。

如今，年轻父母在异地就业务工，将子女留给家中老人照料看护的现象非常普遍。虽然基于“隔代亲”因素，祖父母、外祖父母对孙辈生活上的照护比较用心，甚至远胜于年轻父母的照护，但是，任何人的照料都比不过父母对子女的影响。很多时候，祖父母对孙子女的关怀表现为“溺爱”，而缺乏有效的教育和引导。

因而，留守儿童在心理健康、人际交往、学习能力等方面的表现，远远不及父母长期陪伴的儿童。梳理报道可知，一些校园暴力、欺凌事件，以及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经常出现在留守者身上。

而委托照护义务及由此衍生的随附义务，有望让留守儿童的身心健康和正当权益得到更有效的保障。法律所规定的照护，有别于基于亲情和道义的照护。

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委托照护的被委托人应当具有照护能力，这意味着这个合格的被委托人不能对留守儿童放任自流，只知溺爱而不知管教。同时，留守儿童的父母等监护人不能将委托照护当作“甩锅照护”，应定期与留守儿童联系交流，全面了解其生活、学习、心理状况等情况，予以亲情关爱，缓解留守所导致的心理问题，让留守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为落实委托照护，还应有科学的配套措施。例如：明确委托照护人的权利义务、照护内容、选任顺序，让更适格的人担任照护人；夯实学校、基层政府、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儿童权益保护组织的责任。留守儿童得到充分的关心与呵护，才不再成为心理上的“孤儿”。

甘肃临夏拟改名河州 地名更变要考虑什么

□ 黄 帅

据当地政府官方网站消息，日前甘肃省临夏市拟改名为“河州市”，现公开征求意见建议。此事一经曝光，便在网上引起不小的争议。其实，临夏市要改名的话题，已在坊间流传很久，而且今年6月，当地还组织召开了临夏市行政区划名称变更调研座谈会，对此进行研讨。可见，官方也认为此事事关重大，需要充分了解与尊重民意，审慎而行。

按照当地政府给出的理由，临夏市改名为“河州市”，是为了彻底解决同一行政区域内，临夏州、临夏市与临夏县三地重名造成的诸多现实不便的问题，而且也是为了尊重临夏的历史文化与多民族融合发展的传统。从这个层面上看，城市改名必须考虑到历史文化因素，也要顾及现实中的公共行政管理、民众生活与城市的外部形象问题。

临夏之所以会产生“一地三重名”的现象，与它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密不可分。临夏是中国知名的回族自治州之一，州政府驻地在临夏市，而在市区西南部，还有一个临夏县，这种复杂的行政区划不仅让外界很容易混淆不清，也给当地民众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而且，临夏本来就别称“河州”，这一名字具有较强的民意基础与文化底蕴。综合上述因素来看，临夏改名“河州”也未尝不可。

其实，城市改名并不只是行政区划上的变更，更是一个地区文化认知的改变。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近几十年来城市改名的现象并不少见。其中成功的案例之一，莫过于云南省中甸县改名为香格里拉县。中甸县本来是位于云南省西北部的迪庆藏族自治州的首府之地，本来并不为人所知，当地独特的自然风光，丰富的旅游资源，也一直没有充分发挥效用。

为了提升社会知名度，发展本地旅游事业，2001年国务院批准中甸县改名为香格里拉县。“香格里拉”本来是英国作家希尔顿在畅销小说《消失的地平线》中描述的一个神秘美好的东方秘境，如同桃花源一样的存在。当地巧妙地利用了“香格里拉”这一知名文化符号，打开了城市改名的新渠道，也给本地带来了丰厚的发展资源。

除了发展旅游业，提升知名度之外，还有一些城市改名，则是为了民众生活的方便，并增加地名的通俗性与辨识度。比如，陕西省盩厔县得名于“山曲为盩，水曲为厔”的古语，这个名字用了两千多年，但“盩厔”两字太过冷僻，非常不利于外界辨识，而且地名笔画甚多，也给当地人的生活与工作带来诸多不便，最终依照“同音更变”的原则改名为周至县。

与之类似的情况，还有陕西省葭县，因当时很多人不认识“葭”字，就在上世纪60年代改名为佳县，同样是为了使用方便与辨识清晰。还有醴泉县改名为礼泉县，沔县改名为勉县等例子，都是如此。

从以往的案例看，要兼顾新地名的使用便捷度与文化内涵，才是改名的必由之路，那些只顾“用得方便”却破坏了当地地名文化内涵的做法，会引起不小的争议，长远来看，并不可取。随着时光的淘洗，地名更变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除了成都、邯郸等个别城市，多数城市的地名都变更过，甚至有过多次变更，形成了有趣的地名变更史。

因此，城市改名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只是当地政府在如何选择新名字上，要兼顾历史文化底蕴、社会民意基础，使用便捷程度等因素，谨慎为之。

“毕业寄”传递了母校的安全感

□ 吕京笏

因为疫情，很多2020届毕业生还没来得及跟母校认真道别，就要转身投入社会。离校的日子一天天靠近，留在寝室的个人行李怎么办？为确保毕业生平安文明离校，一些高校的师生员工齐上阵，给未返校毕业生提供了贴心的行李寄送服务，让学生的需求，在疫情防控中得到呵护。

云中谁寄“行李”来？寄者真心，收者暖心。比如，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的志愿者团队，通过线上会议平台，让毕业生可以全方位全过程看到自己的宿舍，确认自己的物品；北京科技大学将普通物品与易碎、贵重物品分开打包、分开寄送，并且为贵重物品进行保价，全部免费邮寄到家；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地球科学学院的毕业生，最近陆续收到了学校在端午节假期寄出的包裹，每个人的包裹上都有教师的亲笔签名及寄语，包裹中还有用大篆字体篆刻的带有学生姓名的专属印章。

毕业，像是一条渡河，一岸是象牙塔，一岸是社会。从相对单纯的象牙塔，到更为复杂、更加残酷的社会，是人生中至关重要而难免坎坷的跨越。毕业生都希望能有一个圆满的毕业季，为大学生活画一个圆满的句号。

然而，今年的许多毕业生无法参加毕业典礼，甚至回学校取行李都成了奢侈。在这样的情况下，学校寄出的是行李，更是温暖，表现出“全心为学生考量”的人文关怀。学校充分考虑学生权益，是教育工作应有的责任。有毕业生说，在收到行李的一刻，感觉毕业就像离家一样不舍，教师的悉心，像极了母亲般“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母校，之所以难忘，不是因为她尽善尽美，而是因为无论条件多么局促、环境多么严峻，她总是用心保护你，给你温暖和安全感。

要求出租车司机有高中以上学历不太合理

□ 欧阳晨雨

据媒体报道，山东济南今年将对《济南市城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进行修改。其中，关于“申请客运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条件”，意见稿的规定之一是“取得高中及以上学历”，由此引发网友热议。

客观来说，在全民学历层次整体抬升的今天，个别职业群体的学历层次的确在提高。有数据显示，我国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和高中文化程度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明显超过了劳动年龄人口下降的幅度。在2006年1月12日通过的《济南市城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上，对申请从事出租汽车驾驶的驾驶员学历条件的规定，还仅是“初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14年后拟变成“取得高中及以上学历”，似乎体现了学历层次的“与时俱进”。

但问题在于，这里的“与时俱进”，并不能覆盖现有的出租车从业人员。按照《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经营性道路旅客运输驾驶员，年龄不得超过60周岁，如此算来，只有60后到00后这个年龄段的人，才有资格申请出租车驾驶员的从业资格。不少60后因时代的局限，在学历层次上不尽如人意，很多人也就是勉强到达初中文化程度。如果将法定的学历条件，抬升到高中以上学历，便意味着这个边缘化的群体被甩出了赖以谋生的行当。

有人说，社会在进步，行业也应升级换代，出租车代表一个城市的形象，高学历的出租车司机，能为城市的形象加分。但是，一个城市既要有“阳春白雪”，也离不开“下里巴人”，有形形色色的人群，参差不齐的状态，才是社会的常态，才有人间生活的烟火气。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如果连低学历司机都容忍不了，又怎么展现博大宽容、兼容并蓄的城市胸怀，展示高大上的良好形象呢？

环顾全球，没有几个现代化的文明都市，为出租车司机设置高学历的就业门槛。这些城市，之所以没有在高学历上做文章，其实是担心撞在了学历歧视、就业歧视这根“高压线”上。我国批准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明确规定了平等就业权，我国宪法也暗含平等就业之义，在《就业促进法》中，更鲜明提出“劳动者依法享有平等就业和自主择业的权利”。从立法的意图看，学历本不应成为劳动者一般性就业的“拦路石”。

就出租车司机这个职业而言，需要的是司机的驾驶技术、道德水平、法律素养，并不是一纸所谓的高学历证书，而高学历也与好司机之间划不了等号。一味强调高中以上学历，其实是人为造成就业机会的不均等，属于不折不扣的就业歧视。

姑且不论法理，开出租车非得高中以上学历，也不合人之常情。按照就业促进法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创造公平就业的环境，消除就业歧视，制定政策并采取措施对就业困难人员给予扶持和援助”。

眼下，一场前所未有的疫情风暴，正席卷全球。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各行各业都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如何保就业、保增长，更是各级政府考虑的重要事项。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任何一个就业岗位的存续，都能稳住一个家庭的温饱生计。人为拔高学历条件，难免造成很多人就业困难，继而给个体家庭、社会大众造成难以消除的负面影响。

立法是一门艺术。对于地方立法，既要顶天，符合上位法的规定；也要立地，接通地气，符合民生民情。在出租车管理条例的修改问题上，于情于法都没有必要把矛头对准“学历问题”。这样既顶了个就业歧视的帽子，又落了个不近人情的骂名，何必如此呢？

古桥保护攸关地方文脉传承

□ 范星盛

7月初以来，南方部分地区的灾害性天气引发各界关注。7月6日，受持续性暴雨影响，位于安徽省宣城市旌德县三溪镇三溪村的乐成桥，被洪水冲毁。乐成桥是始建于明嘉靖年间、重修于清代的11孔石拱桥，是安徽省文物保护单位。7月7日，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镇海桥亦被洪水冲垮，该桥始建于明，也在清代经多次重修，2019年被核定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另有消息称，著名廊桥建筑、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江西婺源清华彩虹桥，近日也在当地洪水中受损严重。这些古桥均为长度超过百米的多孔石桥，在存续的数百年时间内，都是所在地域重要的标志性建筑，见证了古镇的兴衰，如今惨遭损坏，令人格外痛惜。

桥梁在中国古代城镇、尤其是南方城镇中的地位十分特殊，往往是其对外交通和城市内部水系交通的枢纽建筑。宋元以来的南方地方志中多单设“桥梁”一节，记录城中和城郊的桥名，可见其特殊地位。历代递修的古桥常成为传递古城文脉的建筑载体，桥的名称和形态也往往延而不变，是复原古城格局的地标，更是穿越几代人生命历程的历史记忆。古桥的坍圮，是地方“回忆”的终结和“乡愁”的遗失。

古桥如此重要，也颇为脆弱，前述坍毁的几座桥梁都在历史上有多次重修记录。进入现代，部分旧桥仍在交通中发挥作用，其初始设计在于承载车马人畜，难以负荷现代载重车辆，桥面和桥墩等部位由于直接承压，多是受损较为严重的部分；丧失交通功能的古桥缺乏必要的养护维修，流水冲刷、污水浸润和桥体上生长的植物都会威胁整体结构的稳定性。更为致命的是城市建设对古桥存续的影响，由于多处在重要的水陆交通节点，古桥在公路拓宽、航道升级中常被视作障碍，整体拆除、破拆栏板、桥面覆盖水泥成为古桥在现代城建中的宿命。而部分“修旧如新”的维修也常致“古桥不古”，如赵州桥在20世纪50年代，以“压力灌浆”工艺、替换大多数旧石材进行的大修，至今仍备受争议。

对于古桥保护的事业，最重要的是做好基础工作，如此才能抵御突发风险。在前几次文物普查的基础上，进一步摸清古桥家底，建立、完善档案，对于濒危桥梁加强记录，尽快收集散落周边的旧构件，加强保管或在后续维修中配放。对郊野古桥应定期巡检，关注文保爱好者提供的线索，及时发现和排除隐患。也可通过控制车辆载重或另建新桥的方式，保存旧桥桥体，如卢沟桥即通过在旁侧增建新桥的模式，得以完整保存。此外，对存在结构安全问题的老桥应尽快编制保护规划，在汛期来临之前针对性地进行抢险加固。

桥梁文化遗产的保护，不仅是文物部门的工作，还牵涉水利、住建、城规、交通等多部门，在具体保护办法的制定中，亟需明确保护责任主体，压实维保责任。2016年以来，我国推行的“河长制”，对构建监管严格、保护有力的河湖管理机制起到了关键作用，在未来的政策完善过程中，或可将古代桥梁等与河湖相关的文化遗产保护职责也列入其中，以增强属地文保力度。

记得杭侃先生在《永远的三峡》一书中，曾引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先生一段朴实而深刻的话：“我们在外地工作，多年以后回到我们家乡的时候，都希望能够看到小时候玩耍过的地方还遗留着什么东西……如果这些东西没有了，我们会有一种失落感，我们和原来的故乡就缺少了沟通的纽带”。面对古桥保护的事业，我们要时刻不忘这个“沟通的纽带”，愿古桥仍在，登桥远眺，仍足以“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